

侯保重 ● 著



# 遵义会议

## 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三天

ZUNYI HUIYI

JUEDING

ZHONGGUO LISHI

MINGYUN

DE SANTIAN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遵义会议： 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三天

侯保重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1 号**

**责任编辑 苏贻鸣**

**封面装帧 甘晓培**

**遵义会议：**

**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三天**

**侯保重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200020)**

**本书在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医科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8.25 字数 188,000**

**1995 年 4 月第 1 版 199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208—01961—4/D·385**

**定价：8.00 元**

# 目 录

<b>引言：党处在危急关头</b> .....	1
一、王明“左”倾路线统治中央 .....	1
二、王明“左”倾路线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	2
三、红军被迫走上艰辛长征路 .....	13
<b>遵义会议酝酿与准备</b> .....	20
一、通道会议与通道转兵 .....	20
（一）通道会议召开前的形势 .....	20
（二）会议召开：毛泽东的建议被采纳 .....	23
（三）会议影响：红军行军方向的改变，纠正王明错误 路线的开端 .....	26
（四）关于会议的几个问题 .....	27
二、为遵义会议奠基的黎平会议 .....	31
（一）通道会议后的敌我态势 .....	31
（二）毛泽东与李德的激烈争论 .....	33
（三）黎平会议是遵义会议的预备会议 .....	37
（四）关于“转兵”问题 .....	39
三、猴场会议 .....	42
（一）中央红军向黔北挺进 .....	42
（二）会议的召开和主要内容 .....	44
（三）李德指挥权的终结 .....	49

<b>遵义会议的举行</b> .....	50
<b>一、为创建川黔边根据地而浴血奋战</b> .....	50
(一) 突破乌江、智取遵义.....	50
(二) 创建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苏区的努力.....	60
<b>二、决定历史命运的时刻</b> .....	68
(一) 紧迫的会前形势.....	68
(二) 《毛张王提纲》.....	73
(三) 召开会议的具体准备.....	81
(四) 会议的召开和参加者.....	81
(五) 会议主要议程.....	84
<b>三、遵义会议主要文件</b> .....	92
(一) 《遵义会议决议》主要内容评述.....	92
(二) 《遵义会议决议》和《决议大纲》的关系.....	107
 <b>会议使命的继续</b> .....	 120
<b>一、中央红军北上入川和一渡赤水</b> .....	120
(一) 军事形势的发展.....	120
(二) 土城战役及其对中央战略方针的影响.....	123
(三) 中央红军一渡赤水.....	126
<b>二、鸡鸣三省张闻天接替博古</b> .....	129
(一) 张闻天接替博古职务的确切地点.....	129
(二) 权力移交的原因.....	133
(三) 移交会议的规格.....	134
(四) “总负责”人选变动的意义.....	136
<b>三、为创立川滇黔边苏区而斗争</b> .....	137
(一) 一渡赤水后的战局变化.....	137
(二) 毛泽东创建川滇黔边苏区战略方针形成.....	140
(三) 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实现战略转移.....	141
(四) 部队整编和游击区的开辟.....	145
(五) 创建川滇黔边苏区根据地的意义.....	150

<b>四、二渡赤水，遵义大捷</b> .....	151
(一) 二渡赤水，回师黔北.....	151
(二) 遵义战役的辉煌胜利.....	157
(三) 遵义胜仗所显示的.....	164
<b>五、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立</b> .....	166
(一) 遵义战役后敌情的变化.....	166
(二) 红军前敌司令部的设立.....	168
(三) 三人军事小组成立.....	171
(四) “小组”的职责和意义.....	176
<b>六、川滇黔边寻求新机动</b> .....	179
(一) 中央重申创建新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179
(二) 鲁班场战斗和三渡赤水.....	181
(三) 四渡赤水，寻求新的机动.....	189
(四) 南渡乌江，威逼贵阳.....	192
(五) 转兵西指，战略再次转移.....	196
<b>遵义会议意义：历史性转折</b> .....	204
<b>一、党从危难转向辉煌</b> .....	204
(一) 全党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和思想路线.....	204
(二) 开始了党独立自主解决革命和党内问题的新局面.....	208
(三) 引导党的军事路线走上正确轨道.....	216
(四) 恢复党的任人唯贤、五湖四海的组织路线.....	218
(五) 在转变党的政治路线方面的意义.....	220
<b>二、遵义会议开创历史新局面</b> .....	231
(一) 党领导抗日救亡运动进入新阶段.....	231
(二) 党的统战工作进入新时期.....	232
(三) 长征以胜利告终.....	241
<b>后记</b> .....	257

# 引言：党处在危急关头

## 一、王明“左”倾路线统治中央

1931年1月7日，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的直接干预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这次全会以批判三中全会的所谓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为主题，强调反对“党内目前主要危险”的“右倾”，并决定“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瞿秋白、周恩来在会上受到严厉指责。原来不是中央委员，又不了解中国国情，还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和实际革命斗争锻炼的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不但补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四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对中国革命的消极作用很大。从这时起，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党中央领导机关统治长达4年之久，对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王明路线为什么能统治中央4年之久？其根本原因：一是自“八七”会议以来，党内存在浓厚的“左”倾情绪，一直没有从理论上思想上认真清理。二是党内很多干部对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盲目崇拜，对共产国际的错误路线绝对执行。三是党的许多干部马列主义水平不高，实践经验不足。四是王明的这条“左”倾错误路线是共产国际制造的，共产国际又是支持王明上台的。因此，当王明等人，搬出许多马、恩、列、斯等“本本”中的词句和共产国际指示来吓人时，许多人便失去了识别和抵制假马列主义的能力。正是由于王明等人，一方面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另一方面，王明

路线有理论装饰，气焰更盛，比立三路线更“左”，统治中央时间更长，因而危害就更大。

四中全会后，国统区的工作出现了一片混乱。党的许多优秀干部牺牲，个别领导人叛变。在这种极端危急的情况下，周恩来沉着、果断地采取有效措施，机智地保住了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不久，王明离开上海去莫斯科，周恩来也被排挤，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江西瑞金。由于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不到半数，因此，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9月成立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洛甫）、卢福坦三人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博古负总的责任。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继续执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

## 二、王明“左”倾路线导致红军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1931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主义革命，不断向前发展，根据地取得了多次粉碎国民党军队军事“围剿”的巨大胜利。

国民党军队军事“围剿”的重点是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从1930年10月到1931年7月，蒋介石先后调集了几十万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和中央红军接连发动了三次“围剿”。红一方面军遵循毛泽东创立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军事路线和适合红军作战特长的战略战术原则，在毛泽东和朱德的指挥下，痛快淋漓地粉碎了这三次“围剿”。党和红军在反“围剿”中，不但得到了锻炼，而且有很大的发展，根据地在逐步扩大、巩固。

这期间，发生了震动全国的“九·一八”事变。这是日本帝

国主义企图把中国变为其殖民地而采取的重要步骤。接着，日本在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国，把东北变为其殖民地。蒋介石南京国民党政府，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面前，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一再妥协退让。并且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实行以主要兵力“围剿”一贯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中国工农红军的反动政策。中国共产党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从“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就坚决主张对日作战，并命令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均遭到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阻挠。中国共产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得到了中华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全国各阶级的关系和政治势力的政治态度，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主张抗日救亡的阶级、政治团体和军人越来越多。

“九·一八”事变后引起的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没有认识和作出正确判断。主要是没有看到中间派要求爱国抗日的积极态度，看不到国民党和其政府、军队内部正在产生的反蒋抗日力量。相反，他们认为中间势力“是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他们认为“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理由是国民党统治正在加速崩溃。因此，他们采取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的方针，要求城市工人总罢工，要求北方各省党组织发动兵变和发动工人总罢工，立刻创造出北方的苏维埃区域。他们这种“左”倾冒险盲动主义，遭到在白区工作的刘少奇和其他同志的抵制和批评。刘少奇等，依据当时的客观实际，提出了不少正确的意见，临时中央负责人不但不接受，反而把这些意见斥之为“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并撤销了他们的职务。

临时中央这时还在上海。“左”倾路线推行到各革命根据地和各部红军中去，要经过一个过程。1931年11月1日，四中全会

后派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央代表团，主持中央苏区的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在会上，他们把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和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端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右倾”。从此开始，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王明路线。赣南会议结束后，他们立即召开了全国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大会选出毛泽东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组成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任主席，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正式成立。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央对各苏区和各部红军的领导和统一指挥。然而，临时中央片面强调苏维埃政府同国民党政府的对立，急于把分散的苏区联成整个苏区，似乎革命在全国胜利已经到来。这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临时中央起草的并为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规定了“左”的政策，如“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这就造成了中央苏区和其他根据地的社会混乱。这对根据地发展起着极坏的作用。另外，从1930年下半年起，中央苏区党执行中央肃反的指示，出现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把一些忠于革命、忠于党的干部和战士，当做AB团、社会民主党等而杀害，削弱了革命的力量。这对党和红军又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1932年夏，国民党政府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签定了《淞沪协定》以后，积极部署力量，准备对红军进行新的军事“围剿”。这时，王明路线统治的临时中央顽固坚持“城市中心论”的错误部署，使还很弱小（与敌军比）的中国工农红军，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失。5月间，蒋介石又对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军事“围剿”。蒋介石在准备对鄂豫皖、湘鄂西等革命根据地“围剿”的同时，组成以何应钦为首的赣粤闽边区“围剿”总司令部，指挥赣粤闽的国民党军队牵制中央红军的力量。并为大举进攻中央根据地作准备。其时，还在上海的临时中央，仍顽固地坚持其

“错误战略，要求中央红军应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消灭敌人的武力，扩大苏区，夺取一两个中心城市，来发展一省数省的胜利。8月，中央红军在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指挥下，连克吉安、宜黄，取得歼敌三个旅的胜利。可是，临时中央给苏区中央局指示，批评他们不认识采取进攻策略的重要性，犯了“右倾与保守主义的错误”，并批评周恩来到苏区后工作“不得力”。苏区中央局后方负责人，为贯彻临时中央“进攻路线”和指示，与在前方负责的周、毛、朱、王等，发生意见分歧。为解决前方和后方负责人之间的矛盾，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会上，严厉批评前方的军事部署是“纯粹防御路线”，是“以准备为中心的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方针。对毛泽东是否留在前方的问题，发生激烈的争论。周、朱、王等坚持毛泽东留在前方，但多数人不同意。会后，以要毛泽东主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工作的名义，把毛泽东调回后方。随即撤销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由周恩来兼任。从此，毛泽东离开了红军的领导岗位。

1932年底，蒋介石调集30万重兵，分三路向中央苏区发动大规模的第四次军事“围剿”。其时，中央红军兵力约7万余人。苏区中央局速电前方，命令红军主力出击，迅速占领南丰和南城。周恩来、朱德等，从实际出发，复电说明，目前条件不利攻城，应求得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这个正确意见遭到苏区中央局拒绝。周、朱在执行苏区中央局错误命令，率部强攻南丰不克后，迅速将主力秘密转移，寻求机动。在黄陂、草台岗两次集中优势兵力，伏击敌军，歼灭陈诚部精锐主力3个师，缴枪1万余支。这是他们运用毛泽东运动战战术，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中央红军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兵团伏击战的范例。这时，红一方面

军主力发展到 10 万人，中央革命根据地和闽西革命根据地又连成一片（统称中央苏区）。全国革命根据地大小共 15 块，红军发展到 30 多万人，遍布 14 个省区。在最盛时期，苏区人口达 1000 万。这就形成了第二次革命高潮。

正当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进行时，1933 年 1 月，临时中央在上海站不住脚后，迁到中央苏区瑞金。他们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内，全面贯彻王明路线，进一步排斥、否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政策和策略，以及战略战术原则。他们打击了一大批坚持正确意见的、有实际经验的党和红军的领导干部。从 2 月开始，他们在福建开展反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3 月，又在江西开展反所谓“江西的罗明路线”的斗争。这就更强化了王明路线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党、政府和军队中的统治。

1933 年 9 月，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到中国来化名为李德、华夫、A 等）到达瑞金。他是一个外国革命者，是为了帮助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工作的。但是，他完全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发展规律和特点，不了解红军，更不了解中国国内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他只学习了一般战争的原则和第一次世界大战那种正规的阵地战、苏联红军的一些作战经验及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李德到瑞金后，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对他绝对信赖和支持，把党中央的军事大权交给他。为了全面贯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随即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参加的“三人团”，全权领导和决定党中央一切工作的问题。在“三人团”中，博古负责政治、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李德负责军事指挥。红军的军事战略路线和战略战术原则、作战部署等均由李德作主；周恩来只负责督促作战部署、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是一个“管事成员”。“三人团”成了临时中央的“领导核心”。博古说：“三人团处理一切（博、

李、周)。<sup>①</sup>

蒋介石在对红军第四次军事“围剿”惨败后，积极准备发动第五次“围剿”。他聘请了外国军事顾问，总结了前四次“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进行了较长时期的多方面的周密准备。在军事上，采取了“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的战略战术原则。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逐步推进。在各方面准备就绪后，他自任总司令，调集100万军队，200架飞机，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其中，以50万兵力，从1933年9月下旬开始，重点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猖狂的进攻。

其时，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力红军有8万多人，地方军和游击队等人民武装力量也有较大的发展。但从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看，我仍处于劣势，敌处于较大的优势。但是，尽管形势很严峻，在1933年10月中旬举行的中革军委会议上，毛泽东就再三说明，敌人这次“围剿”，妄图以堡垒战和持久战来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以达到消灭红军的目的。克敌制胜的办法，战略上仍是采用决战防御，战术上采用运动战速决战和游击战相配合的战略战术。当时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战法。<sup>②</sup>但是，这些正确意见，竟遭到了博古、李德的拒绝。他们采取了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来对付敌人的第五次军事“围剿”所采取的持久战和堡垒主义战略战术。他们机械地坚持进攻战略，大搞“左”倾冒险主义。在1933年6月敌人第四次“围剿”粉碎后，他们立即把中央红军主力分离（主要是一、三军团分离），一部分组成中央军，在抚河、赣江之间作战；一部分组成东方军，入闽作战，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进而夺取抚州、南昌等中心城市，以实现他们的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在当时

① 《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3页。

② 《刘伯承军事生涯》第70—72页。

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这种两个拳头分开来击敌的作战计划,只能是徒然分散兵力,违反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战术原则,使红军陷入战略上的被动局面,也使红军失掉了为下一次反对敌人“围剿”作准备的宝贵时间。其结果,东方军入闽作战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由于连续作战,打得很疲劳;中央军则没有什么仗可打,被置于无用之地。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之后,博古、李德提出这次战争是“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和“不放弃根据地一寸土地”等脱离中国革命斗争实际的空想的冒险主义口号。在1933年9月28日,敌军占领黎川后,他们震惊于黎川一城之失。李德认为,只有收复黎川,才能保住“国门”,又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口号,反对毛泽东的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正确战法。于是,李德急忙命令红军主力冒险北上应敌,搞盲动。这种瞎指挥,只能使红军转战于敌人主力和堡垒之间,陷于被动。红军连续作战两个月,不但没有能打败敌人,反而受到很大损失。在盲动冒险进攻受挫后,他们又从军事冒险转到军事保守,采取消极的分兵抵御、“短促突击”。用阵地战代替运动战的战术,同强大的敌人打单纯防御的阵地战。他不是扬长避短,而是以装备低劣、兵力上又占劣势的红军,同装备精良、兵力又占优势的敌军打堡垒阵地战,拼消耗。这种荒唐指挥,造成战争的发展对红军日益不利局面。

其时,出现了一次有利于红军粉碎“围剿”的好机会。这就是,曾在上海坚持抗日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将领,于1933年11月,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简称福建人民政府),公开宣布反蒋抗日。他们并派代表,同红军谈判合作,双方签定了抗日反蒋协定。但是,博古、李德等人认为,十九路军的抗日反蒋是“欺骗群众”。因此,不肯在军事上同十

九路军配合反蒋。这种“左”倾近视眼，使他们不可能看到、也不知道如何从政治上、军事上借助“福建事变”，去粉碎蒋介石发动的这次军事“围剿”。毛泽东却看到了。他说，这时曾建议红军主力“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sup>①</sup>毛泽东认为，这样必定可以迫使敌军回援其后方根本重地，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军事“围剿”；同时，也从军事上有力地援助了福建人民政府。可是，博古、李德拒绝了毛泽东的正确建议。

12月初，蒋介石命令蒋鼎文率两个师，从南丰以南向闽西开进，去镇压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时，红军主力一军团就在附近，且处于敌军的侧面，正好提供了消灭该敌的有利战机。但是，李德却命令部队不准打，把敌军白白放过去了。李德继续推行“两个拳头张开打敌人”的冒险盲动的作战方针，仍将红军主力一、三军团分开，把三军团放在福建，一军团放在中央苏区北线，调至永丰地区作战，企图突破敌军堡垒封锁线，其结果，一军团在毛丁山地区打了一个得不偿失的消耗战；三军团在福建协同七军团，进攻当地军阀据守的沙县，耗去了半个月时间，才占领该县。其时孤立无援的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在蒋介石重兵进攻下，于1934年1月完全失败。之后，蒋介石又回师来“围剿”红军和中央苏区。中央红军就此丧失了借助福建事变，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一个十分有利的良机，相反，蒋介石在镇压了福建事变，打败十九路军后，对军事部署作了调整，完成了对中央苏区的四面包围。这就造成了红军在中央苏区很难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军事“围剿”。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一卷第236页。

对博古、李德推行的王明路线，特别是军事上的错误路线和瞎指挥，在党内和军内不是没有争论和斗争的。毛泽东、周恩来和一、三军团首长等，都进行了不同程度、不同方面的批评和斗争。但是，博古和李德，不但拒绝了毛泽东的正确建议，而且也拒绝了“三人团”成员周恩来“有些各别战役的不同意见”。当时担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说：“周恩来同志当时也是军委副主席，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同李德接触较多，曾经与李德进行过多次争论，表示不同意李德的某些军事主张和作战方案。特别在如何使用兵力的问题上，李德强调所谓‘正规军’打‘阵地战’，用红军的‘多路分兵’对付敌人的‘多路进击’。周恩来同志主张集中兵力于一个方向，其他方向则部署牵制力量，使红军保持相对的优势和机动兵力，以粉碎敌人的进攻。但是，李德拒不接受周恩来同志的正确建议，使分兵把口的红军被敌人的强大兵力各个击破。……只是由于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坚持‘左’倾错误，尤其是支持李德的独断专行，周恩来同志只能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采取某些具体措施，进行适当的补救，尽量减少红军的损失。”<sup>①</sup>史料记载，博古、李德“这种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一个很长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毛张王曾经提出过许多意见，就是恩来同志也曾有些个别战役上的不同意见，但是没有胜利地克服这种错误。至于各军团——尤其是一、三军团的首长不知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被采纳。”<sup>②</sup>

蒋介石在镇压了福建事变之后，又卷土重来。他命令国民党军队，从东、北、西三面向中央苏区推进，粤军从南面防堵。这

<sup>①</sup> 《遵义会议文献》第 112—113 页。

<sup>②</sup> 《遵义会议文献》第 41 页。

时，李德已由军事冒险主义转变为军事保守主义。这样红军在作战中，处于极端被动的劣势地位。李德在单纯防御路线指导下，企图要红军以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的战术，来顶住敌军的进攻。他命令红军主力进攻敌军堡垒阵地或以堡垒作依托的敌军阵地。其结果，从1934年1月下旬到3月下旬的这段时间内，红军不但没有击破强大敌军的进攻，反而使红军节节败退，主力遭到重大伤亡，造成士气低落，被迫撤出战斗，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4月10日，蒋介石集中11个师的重兵，进攻中央苏区的门户广昌。敌军利用抚河的有利地形，交替筑堡向前推进，边进边修碉堡。这时，李德不顾敌强我弱的军事形势，下达了死保广昌的命令。提出了“死保广昌”、“寸土必争”的错误口号。他调红军主力一、三、九3个军团9个师的兵力，同强大敌军决战。4月底，红军终抵不住敌军的强大进攻，被迫撤出阵地，广昌失守，红军主力伤亡5000余人，占参战部队总数兵力的1/5。这种情况，对以后红军的作战，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7月上旬，蒋介石调集重兵开始向中央苏区中心区进攻。李德又错误地命令红军主力“六路分兵”、全面抵御。可是，各路红军在7月份仍没能够抵住敌军的进攻，只能是节节抵御、节节败退。8月，敌军以重兵向驿前、小松、石城进攻，又向兴国的高兴圩、宁都以西的古龙冈、长汀东南的中屋、河田推进。到9月下旬，中央苏区已缩小到只有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城和这些县城之间的狭小地区。

红军完全陷入了被动的局面，造成中央红军在中央苏区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战争中的极大困难。中央红军在中央苏区无法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了。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下，“三人团”作出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重大决定。在制订战略转移中